

辛亥革命敘事與新加坡國族建構：晚晴園中的展覽政治

**Narratives of Revolution of 1911 and Nation-Building of Singapore:
Politics of Display in Singapore's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第一作者姓名：張碧君

任職機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職稱：助理教授

通訊地址：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電話：0922197887

Email: pcc@ntnu.edu.tw; pichunchang@gmail.com

中文摘要

本文以新加坡的晚晴園（亦稱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為例，分析新加坡的國族建構如何在辛亥革命的脈絡下被重新想像。晚晴園自 2009 年開始隸屬於新加坡國家文物局之後，經過翻修、擴建，於 2011 年重新開放。自隸屬於新加坡國家文物局之後，晚晴園的展覽內容、分類系統，必須彰顯文物局成立之目標，即國家文物局肩負國族建構、凝聚認同的責任。本文探討一、辛亥革命、抗日救（中）國的新展覽內容如何在減少與南洋的連結之際，增加了與新加坡歷史更為相關的部分，亦即晚晴園的展覽如何再現國家意識形態？二、孫中山與當地革命先賢之歷史，又如何與新加坡認同凝聚息息相關，其中的文化政治如何從泛華人民族主義轉化成新加坡國族認同？。據此，本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晚晴園的歷史、過去展覽，及其改變歷史定位的過程與官方論述。第二部分以文化展覽上所發展的「詩學」與「政治」理論為基礎，分析晚晴園於 2011 年重新開放的展出內容。第三部分則將展覽內容的文化政治與新加坡在殖民時期與二戰時期的歷史圖像作一對照，並藉此檢視新加坡作為一「國族」的想像，以及新加坡的生存危機想像。經過對照與分析，本文認為：晚晴園的展覽顯示新加坡政府試圖將國族想像的歷史系譜推至獨立建國之前，並試圖為重商意識形態展開歷史鋪陳。

關鍵字：晚晴園；展覽政治；意識形態；認同想像；生存危機

英文摘要

Narratives of Revolution of 1911 and Nation-Building of Singapore: Politics of Display in Singapore's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Taking Singapore's "Wanqingyuan," also termed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how the new displa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overseas Chinese anti-Japanese movement relate to Singapore's history? In other words, how the display serves Singapore's national ideology? Secondl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pan-Chinese nationalism has transformed into fortification of "Singaporean" identit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ccordingly.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Wanqingyuan's history, past display and the official discourses regarding its historical status.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display based on Henrietta Lidchi's theory. This paper then compa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display and Singapore's historiography during colonial and war period. Based on this comparison, the imaginary of Singapore as a "nation," the imaginary of "Singaporean" identity and the imaginary of Singapore's survival will be examined. Final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ew display not only extends but also re-affirms the priority and necess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Keywords: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cultural display; national ideology; identity; imaginary of survival

辛亥革命敘事與新加坡國族建構：晚晴園中的展覽政治

Narratives of Revolution of 1911 and Nation-Building of Singapore: Politics of Display in Singapore's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一、前言：新加坡的後殖民國族建構

新加坡自 1842 年起成爲英國殖民地，二次大戰期間曾一度被日本佔領，戰後再度成爲英國的直轄殖民地，並於 1959 年獲得自治的地位。1963 年，與沙巴、砂勞越一起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但在時任馬國總理東姑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的堅持下，新加坡於 1965 年被迫退出聯邦，自此成爲獨立的主權國家。然而，在獨立初期，一方面新加坡的工業化剛起步，頓時失去馬來內陸市場，島國生存的危機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在政治路線上，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在清除左派華人勢力、摒棄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後，即決定循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模式，視經濟發展爲國家賴以生存的核心基礎，藉此對甫享有主體性的「新加坡人」承諾改善物質生活條件、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Chua 1998: 29-31; Velayutham 2007: 64)。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新加坡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於 2010 年已將近六萬美元、對外貿易總額高達九千多億美元、失業率低於百分之三，¹人民普遍享有高水準生活品質，人均收入在東亞地區名列前茅。如此亮眼的經濟成績，有賴於星國政府所主導的經濟策略與社會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塑造。

新加坡的經濟表現在東南亞一枝獨秀，但其國家意識的形塑與「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的歷程卻不脫離東南亞各國類似的境遇。民族主義在二次大戰之前已在東南亞興起，但民族國家的建立卻多始於二次大戰結束之後(McVey 1984: 3)。正由於族國肇建初始即需同時面對與處理政治穩定、族群融合、經濟發展等等議題的「加速過程」(accelerated process)，故政府有必要展現其決策力、領導力與執行力。這樣的脈絡使得國家的權力不只是抽象的存在，而需要與人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作爲經歷不同外來統治者的新興國家，在獨立建國後面臨重新詮釋歷史的必要性(Hobsbawm 1992)。因此，政府需要積極地創造論述，以及國家的自我再現。國家生存的危機感將追求經濟成長的動機加以正當化，經濟發展的成績則相對地合理化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正當性。

在成爲「新加坡人」之前，該地的住民幾乎都來自中國大陸、馬來半島或印

¹http://www.sedb.com/edb/sg/en_uk/index/why_singapore/singapore_facts_and_figures.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3 月 20 日)。

度，心目中的「家鄉」即是自己的祖國。因此，獨立建國後，新加坡政府的一大課題即是建立與凝聚國族認同。華人雖然是主要族群，但自覺難以被周遭的馬來世界（印尼、馬來西亞）所接受。馬來人是為數不少的少數族群，卻無法在政治階層積極活動。印度人則面臨為數最少，與被馬來世界包圍的雙重困境。在這樣的情境下，共享的文化與價值似乎並不存在（Chua 1998: 30）。但整合不同族群的共同連帶卻又是認同建構的重要元素。

此外，國族建構在經濟發展成功之後仍面臨凝聚國家認同的挑戰，因為亮眼的經濟成績並不足以為現代國家提供人民所需的自我認同（Ang and Stratton 1995: 74）。換句話說，衡量國家是否成功的條件，並不等於凝聚認同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意識形態需要新的詮釋，卻需時時召喚過去的歷史。新加坡的晚晴園（亦稱孫中山南洋紀念館），自 2009 年開始隸屬於新加坡國家文物局之後，經過翻修、擴建，於 2011 年重新開放，巧妙地肩負國族建構、凝聚認同，以及深化國家意識形態的責任。²由於文物局的宗旨是：「藉由遺產與文化發展強化國族歸屬感、認同感與創意」，本文希望探討關於辛亥革命、抗日救（中）國的展覽如何與強化國族歸屬感與認同感之連結。³據此，本文之研究問題並非探討自辛亥革命以降之海外華僑歷史，亦非孫中山先生在南洋之革命歷程，而是以晚晴園之展示為個案，探究新加坡政府如何藉由規劃晚晴園的展覽而再現其欲建構之國家意識形態？如何從泛華人民族主義轉化成新加坡國族認同？故本文之目的在於探究文化與政治的聯結及其聯結的途徑。其問題意識值基於文化展現所具有的政治性，以及國家機器藉由文化活動以遂行其政治目的之途徑。然而，博物館從來都是「據有爭議的場域」（contested terrain）（Lavine and Karp 1990: 1），從符號學的角度看待展覽物件有可能衍生多元詮釋。因此，本文旨在揭示政府在掌握符號後的文化假設與政治動機。

據此，本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晚晴園的歷史、過去展覽，及其改變歷史定位的過程與官方論述。第二部分則以 Henrietta Lidchi 在文化展覽上所發展的理論為基礎，分析晚晴園於 2011 年重新開放的展出內容。第三部分則將展覽內容的文化政治與新加坡在殖民時期與二戰時期的歷史圖像作一對照，並藉此檢視新加坡作為一「國族」的想像，以及新加坡的生存危機想像。兩相對照下，晚晴園的展覽政治所顯示的是：符合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性，遠高於反應史實的忠誠性。根據 Halbwachs 的觀察，集體記憶是經過選擇性的紀錄，並經過每一代不斷得以更新與形塑，晚晴園的展覽內容排除了某些歷史論述與生命軌跡，但肯定了新加坡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延續著重商意識形態的發展，展示了一個相同主題的不同建構方式。

²到目前為止，隸屬於新加坡國家文物局的紀念館只有兩個（另一為馬來文化紀念館）。基於此，以晚晴園為個案探討新加坡官方的意識形態建構應相當具有代表性。

³<http://www.nhb.gov.sg/WWW/vision.html>，（瀏覽日期 2012 年 3 月 20 日）。

二、分析途徑：展覽與政治

本文以文化展覽的詩學 (poetics) 與政治 (politics) 為理論基礎，來探討新加坡晚晴園在隸屬於國家文物局之後所再現的國族建構。展覽從來不是中立的行為，而是一連串詩學與政治的組合，在 1988 年於史密森機構 (Smithsonian Institute) 所舉行的研討會中有著一系列的討論。⁴例如，Kirshenblatt-Gimblett (1988) 在會後出版的論文集集中說明，為物品提供展示的脈絡並非是單純的行為，它牽涉為物品標籤的方式、與其他物品的關係、展示的背景、甚至視聽輔助的設計。她同時指出，許多陳列在歷史博物館、人種學博物館、或自然博物館裡的物品，若不經過解釋就不具有太大的意義。然而，解釋就需要詮釋，而詮釋絕不會是中立而客觀。不同的文化對於如何詮釋與如何展示，都會做出不同的價值判斷 (Clifford 1997; Thomas 2001; Witcomb 2003; 王嵩山 2006)。在物品並不具備個別意義的情況下，Carol Duncan (1988; 1995) 以公立美術館為例，視收藏品與作為展示的建築與地景為一種「儀式場地」(ritual sites)，其組織與制度化的過程均有政治性的安排，目的使展覽具有美感，同時看來又再自然不過。即便看起來距離政治遙遠的藝術展覽，實際上也不脫政治性目的或動機 (Ybarra-Frausto 1988)。

Henrietta Lidchi 則在探討「他者」的再現時，仔細定義了展覽中的詩學與政治。Lidchi 認為：要了解博物館中的再現，就必須從兩方面來檢視，一是分類系統，二是展覽內容。博物館的展覽並不只是物品展示，更多時候是展覽傳達了想法，「關於目前所處世界的面貌，或者應有的面貌的想法」(1997: 10)。據此，物品的物質面展出，與象徵性意義需被分開看待。根據 Lidchi 的理論，博物館是有系統地將展品分類，是「根據某特定地方，所產生之特定世界觀，在某特定時刻，依據某特定知識體系」所做出之分類 (1997: 162)。物品的象徵意義，則在於它如何被編碼與解碼，將民眾原本不熟悉的訊息，轉換至可被理解的意義。物品的意義，因此是被建構出來的，並且會依據不同的歷史脈絡，所參照之不同的分類系統，而有所改變 (1997: 166-7)。Lidchi 所稱之「詩學」，係指「經由內部排序[物品]而產生意義的實踐，以及物品在展覽中分別列置，卻彼此互有相關性的安排」(1997: 168)。這牽涉了博物館採用了何種再現策略，既臨摹現實，又宣稱本真性。另一方面，Lidchi 所稱之「政治」，是「博物館（或展覽）在產生社會知識當中，所扮演的角色」(1997: 185)，需要檢視博物館的性質，並認為博物館的收藏過程是一連串的歷史性、社會性、政治性事件。換句話說，展示的「詩學」即是政治性的實踐。

從關於博物館詩學與政治的討論，就不難理解 Timothy Luke (2002) 將博物

⁴ 史密森機構是美國唯一的國家博物館。

館視為是政治空間的視角。博物館常被視為是知識的認證機構，也因此經常是提供執政者穩定性與正當性的工具。Luke 以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為例，一方面對宣稱大屠殺不存在的人釋放訊息，另一方面表明了它在美以關係中的位置。Luke 也分別以兩場時間上相隔十年，但都在華盛頓特區展出的日本藝術為例，闡述西方對日本的認知有何時代變遷。換句話說，當博物館包裝知識時，展覽其實提供了一套結構性的規則，供訪客詮釋展覽主題。本身就在史密森博物館從業的 Spencer Crew 與 James Sims（1988）就指出：我們以為博物館致力於呈現本真性（authenticity），但本真性的重點非關史實，而在於權威（authority）。

在承襲文化展覽是詩意與政治結合的思維下，國家級典藏機構的角色變得格外重要。國家博物館及相關機構的規劃、成立、展出內容、展覽特色，都可能是不同階段政府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曾信傑 2010）。新加坡的晚晴園從私人機構躍升為官定國家古蹟，展出內容亦歷經數次轉變。以下就 2011 年重新開幕後的新展覽，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意識形態。⁵

三、個案研究：晚晴園的歷史沿革與定位變遷

晚晴園原是潮州商人張永福買給其母安享晚年之用，引用詩人李商隱的詩句「天意怜芳草，人間重晚晴」，取名為「晚晴園」。在張永福參與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之後，經其母首肯，將晚晴園提供給革命黨人作為聚會與商議的場所，因而成為南洋華人與孫中山革命的聯結象徵。正因為張永福為革命運動出錢出力，終至不惜出售晚晴園來支持革命。故其後該園產權曾數度易主，甚至曾落入印度買主之手。1937 年，正值國民政府領導抗日如火如荼之際，由六名華商買回該園產權並贈予國民黨。國民黨出資修建後於 1940 年開放給大眾參觀。但在新加坡遭日軍占領後，該園曾被移做日軍通訊基地。二戰結束後，國民黨重新加以整修，並成為國民黨的新加坡黨支部所在地。中共建政後，英國政府不允許國民黨部在新加坡續存，因此晚晴園的所有權便就近移交給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直至 1990 年代初期，由於政府政策思維改變，⁶晚晴園的歷史定位與評價也隨之改變，並於 1994 年被認定為國家古蹟。該園自 1997 年關閉，經重新翻修後於 2001 年重新開放。該園自 2009 年起由新加坡國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負責維護、營運與策展，但所有權仍歸屬中華總商會，經文物局再次規劃與擴建後於 2011 年開放（Hong and Huang 2008: 182-5）。

（一）、晚晴園重獲官方重視之政治動機與設想

⁵ 本文並不否認展覽物件作為符號的不穩定性、模糊性，甚至反身性。本文希望闡述的是權力掌握下的符號對國族建構的「使用價值」與「相關性」。

⁶1990 年代，政府將新加坡規劃為全球城市，而全球城市的行銷手法之一，便有賴於凸顯自身特有的歷史感（見 Short and Kim 1999）。

1. 新加坡成爲南洋華人與辛亥革命的聯結

主導第一次翻修與重新開幕的時任資訊與藝術部部長楊榮文說：「長期以來，我們不願將晚晴園視爲國家古蹟是認爲它與新加坡沒有關連。但現在的思維不同。新加坡人在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場革命不僅是政治上的革命，也是文化上的革命。它改變了全世界華人的自我認知，也改變了歷史，而我們該爲本地先賢的貢獻感到驕傲」（楊榮文談話，引自海峽時報 2001 年 5 月 1 日）。因此，2001 年起重新開放的晚晴園，踏進園內展館一進入眼簾的是一組包括孫中山、張永福等人在內的人物塑像，重現當年革命黨人於園內議事的歷史場面。另有六間展覽廳：和平室、奮鬥室、集思室、新加坡室、南洋室和遺珍室。在黃花崗起義捐軀的烈士中，華僑就有三十一人，其中新加坡人十多位，這些史實在奮鬥室、南洋室、新加坡室都有充分的展示。除了歷史圖片，另有多幅油畫重現孫中山在南洋奔走於橡膠園和錫礦場的事蹟，如，孫中坐船沿馬來亞河岸，深入錫礦場向礦工演講的場面、東南亞華僑在辛亥革命後紛紛剪掉辮子和摒棄纏足陋習的情景等。此外，紀念館裡有一條「歷史走廊」作爲館內展覽的背景，展出的是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地圖，和強迫清政府簽定的八個不平等條約（彭一萬 2011；楊兆麟 2002；元輝 2002）。

展覽的安排與內容顯示「南洋」是個以中國爲中心的概念，也主要突顯孫中山與南洋的連結。2001 年重新開幕後，原本就有的孫中山銅像仍處於戶外花園的中心。展覽的重心是在孫中山與東南亞海外華人社群的連結，包括孫在新加坡停留或造訪馬來西亞的怡保、檳城、瓜拉庇勞、吉隆坡等地的史料。但因爲政府之前對此園區的忽略，加上日據時期遭到破壞，使得史料不足，也因此被定位爲紀念館，而非是博物館（Hong and Huang 2008: 196）。

2. 新加坡可作爲華人社會政治溝通的中介場域

事實上，晚晴園與辛亥革命及國民黨的歷史聯結，亦促使新加坡政府對其歷史定位與評價的改變。此與兩岸關係的演變，以及長期以來新加坡在兩岸間扮演的特殊角色相關。因爲晚晴園的存在，爲新加坡作爲兩岸協商談判的中介場所，提供必要的正當性與歷史感。藉此亦更彰顯新加坡在地緣政治與外交上的靈活性與重要性。1998 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公開提議晚晴園可作爲北京與台北的協商之處，汪道涵並於隔年造訪時給予肯定。當年的辜、汪會談便於此舉行，兩人的題字亦被複刻於同一塊石板上。楊榮文認爲晚晴園見證了華人在政治上的分歧，但在文化上的融合，該館的角色因此從紀念辛亥革命的「歷史遺跡」轉變爲「文化殿堂」。曾經以中國爲中心而衍生出的「南洋」概念，如今因擔任政治捐客的角色，而代表新加坡先賢與中國革命及政治變遷的密切關連，不但不是該國

的歷史包袱，反而突顯新加坡在當前兩岸華人的政經互動與博弈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微妙角色。

3. 象徵新加坡具有豐富多元歷史遺產與追求現代化的精神

尤有甚者，新加坡政府重新重視晚晴園的歷史與文化意義，有著更宏觀的戰略目的：新加坡不只是一個小島國，而是擁有豐富歷史與文化遺產的地方，更是一個參與及掌握區域政經脈動的中心。事實上，作為區域中心也正符合新加坡政府所提出的「大新加坡」概念（A Big Singapore），即藉由新加坡本身的多元性，將此島國延伸連結到全世界的經濟與文化領域，而成為匯聚經濟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區域中心。新加坡政府以更具高度的視野，將辛亥革命視為人類歷史上偉大的革命之一，其規模與影響超過美、法等革命。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先賢不僅參與革命，更親身見證了此一改變人類歷史與思想的偉大歷程。當地先賢的貢獻並非僅有金錢上的資助，更有起義的策劃與直接參與。在以楊榮文為代表的官方認知裡，辛亥革命的劃時代意義，可以形塑為新加坡獨立建國前的奮鬥史，以及新加坡人一起向前推動人類思想的巨輪及世界政治文明的革新。

新加坡華人不僅為中國的進步而奮鬥，也為新加坡的華人社群，最終更為新加坡的現代性而奮鬥（Hong and Huang 2008: 190）。若沒有辛亥革命的發生，中國社會可能仍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而新加坡華人可能也不是今日的現代華人。因此，孫中山先生所激發出的中華民族主義，實際上為新加坡國族主義提供了能量（楊榮文談話，海峽時報 2000 年 4 月 2 日）。晚晴園被視為是新加坡現代性的起源：「它不只是個老舊建築物，而是我們（現代性）起源的象徵」（楊榮文談話，海峽時報 2000 年 3 月 26 日）。在官方的邏輯裡，辛亥革命所蘊含的反殖民動能為二戰後的新加坡獨立提供基礎能量，最後並非只造就島上的華人社群，而為今日現代化的新加坡帶來可能。晚晴園歷史定位的調整，在於官方將作為華人的文化意義與政治意義分開看待，其中認同的是孫中山將華人思維帶往現代化的轉變。

由此觀之，晚晴園地位的調整，顯然是國族意識建構計劃的一部分。國族建構需要榮耀的過去，便突顯官方重新創造傳統、神話與國家英雄的必要性。新加坡尋找光榮過去的企圖，導致了中華民族主義、文明論述與新加坡的歷史系譜互相糾結，這顯示新加坡面對中國崛起時，重新強調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社會的核心（Tan 2003）。新加坡的國族論述被放置在革命運動裡，以革命所牽涉的時間、意義與主要族群，來改寫國族建構。循此，新加坡國族主義乃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啟發。然而，以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為起源的星國族主義卻有其矛盾（Tan 2003; Hong and Huang 2008）。Tan 認為新加坡在建國初期經歷了去華人性（de-Chineseness）的階段，但在中國崛起後，當局開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

面向突顯華人性，晚晴園只是其中一例。Hong and Huang 針對晚晴園 2001 年的重新開放提出觀察，認為華人性的提昇透過晚晴園而彰顯，並得以拉大新加坡的想像縱深而成爲一個「大新加坡」，然而此一想像卻刻意地排除某些歷史段落。新加坡政府一方面重新肯定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地位，並希望藉此豐富新加坡的歷史；但另一方面卻選擇性地呈現過去，將晚晴園所代表的歷史與背景簡單化。像是中國國民黨從 1920 到 1940 年代的遺緒、中日戰爭的歷史，以及在中日戰爭中犧牲的烈士被刻意排除。⁷人物蠟像與油畫將孫中山與新加坡的連結神話化，孫中山被定格爲一永遠充滿活力、理想性與奉獻精神的偉人，而新加坡則是劃時代偉人的革命夥伴與繼承人，故無形當中「新加坡人」亦仍由華人族群所定義(Hong and Huang, 2008: 198-203)。

(二)、展覽鋪陳的國族政治意涵

晚晴園在 2011 年重新開放後，主要分爲四個展區。第一展區主要爲革命歷史與三位人物；第二展區是關於同盟會的成立；第三展區是介紹辛亥革命成功後的故事；第四區是民國建立後對南洋/新加坡的影響，以及抗日歷史。第一個展區介紹了三個革命支持者張永福、林義順與陳楚楠，並且從家庭生活的角度介紹。張永福是土生華人(peranakan)，並與當地馬來土著通婚。展區並有張永福的家族照，其中可以看到張永福母親的娘惹裝扮。除此之外，亦展示張與其妻的晚年照。照片中張著唐裝，是一個回歸傳統的象徵。林義順是張永福外甥，亦是土生華人。由於林的英語能力相當好，在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時，被委任爲涉外溝通與交際工作之負責人。陳楚楠是新客華人的身分，亦是華社領袖，有中年與晚年的生活照展示，穿著打扮較爲時尚。亦展出陳楚楠的懷錶，與上頭刻著「結愛國緣」的珍藏印章。辛亥革命與新加坡產生連繫，是因爲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看到了在南洋出現的第一份革命報章「圖南日報」，因此透過尤列，⁸希望認識在新加坡支持革命的商人張永福與陳楚楠。展出的「圖南日報」的報徽上有美國的自由鐘與獨立旗幟，顯示反清的政治詞彙具有現代性與跨國性，現代中國的革命運動繼受近代人類政治與社會革命的潮流及思緒。

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亦具有民族融合的意涵。雖然孫中山推動革命早期確實以反對滿洲政權爲號召。但隨著梁啟超等人提倡具族群包容性的中華民族主義成爲主流，以及許多滿族志士亦加入革命行列，孫中山逐漸提倡族群共和的民族主義，以推翻腐敗政權，達成五族共和爲目標(Wang 2005: 263-4；金衝及 2001: 17)。早在辛亥革命前的 1905 年，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即強調「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

⁷例如在戰後開放的晚晴園曾有因「五三慘案(濟南慘案)」而遭日軍殺害的蔡公時銅像。該銅像是由陳嘉庚捐贈，但於 2001 年重新開放時被移除(Hong and Huang 2008: 274，註解 68)。

⁸尤列爲清末革命運動中，被清廷視爲「四大寇」之其中一人。

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孫中山 1981a: 311)。「兄弟曾聽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前揭書: 324, 325)。另外，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後的 1912 年 1 月 1 日於其「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進一步宣示「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孫中山 1981b: 2)。孫中山倡導五族共和爲辛亥革命是推翻不義政權、促進民族融合的民族與民主革命下了明確的註腳。因此，標舉辛亥革命的民族意涵與新加坡政府建構族群和諧共榮的論述，可以相輔相成。

第一展區主要介紹辛亥革命與新加坡產生關係的起源。第一步是鮮活化新加坡革命先賢的歷史。三位革命先賢的介紹都有其家庭與生活照，顯示除了革命追隨者的身分外，更因其後代在新加坡生根，被賦予了在地先賢的身分，是從人性化的角度重新敘述「屬於」新加坡的故事。其中還展出張永福寫給孫中山和廣州國民黨支部的信函副本、張於 1933 年出版的回憶錄「南洋與創立民國」，以及陳楚楠 1940 年所寫的「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藉革命先賢之口，推翻過去新加坡人認爲辛亥革命與新加坡無關的印象。另外，張永福的弟弟張華丹曾任同盟會會長，是現任新加坡副總理兼國家安全部長與內政部長張志賢的曾祖父。展出文物亦包括孫中山送給張華丹長子張明遠的一幅揮毫書法「博愛」。展區亦展出當時新加坡港口的照片，孫中山即從該處登上新加坡。另有一張當時新加坡美芝路 (Beach Road) 的照片，美芝路上有不少華人產業公司，包括林義順與陳楚楠。展覽生活照的房間擺設採用許多古董家具，以及當時流行的彩色玻璃裝飾，增加土生華人色彩。因此，藉由照片、文獻、書籍、隨身文物等，在地先賢藉辛亥革命來追求自由價值與現代化，以及具理想性之實業家的形象，變得具象化。

走到第二展區，需要經過當時先賢們走過的樓梯，並且看到同盟會成立時宣誓自我犧牲的宣誓言。走上二樓時，會看到烏鴉飛舞的影像與聲音，這是模擬同盟會創立當晚的情境。在同盟會成立當晚，晚晴園屋內飛來烏鴉，大家感到這是不祥之兆，孫中山則解釋烏鴉是爲了躲避外面的大風而飛入屋內。旁邊展示一張同盟會成立後所拍攝的紀念照，包括當時最早的成員。這個模擬空間在 2011 之前，原爲一蠟像室，模擬當時一場秘密會議。參與人士除了孫中山、黃興等人，還有當地三位主要革命支持者。另外還包括鮮少在史料中被提及的陳翠芬與其胞弟陳和。陳翠芬作爲孫的革命同志與伴侶，在展覽中的呈現是孫的女性友人與知己，爲孫及其追隨者燒飯洗衣，被當地學者認爲是儒家父權秩序與禮儀教化的展現 (Hong and Huang 2008: 197)。

而今蠟像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媒體的藝術性表現，以書法影像投射志士們寫給家人的訣別書，亦有來自南洋華人的生命故事，敘述如何爲革命捐軀，當中

透露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雖然效忠的對象是「想像的」中國，但當中所透露出的集體情感卻是新加坡國族建構所需要的。烈士們的犧牲精神在崇尚物質的消費社會看來特別不可思議，但集體高於個人的意識不但符合李光耀前總理曾提出的「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也符合新加坡政府在 1991 年發表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Shared Values*)，內容為「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換言之，烈士的犧牲精神肯定了集體主義優於個人主義的崇高性。當「共同價值觀」成為國家意識形態，表示集體意識應作為不同族群的共同連帶，成為國家需要的共同價值。其次，展示訣別書的另一目的，是將歷史敘事賦予情感，將願意為理想捨棄生命與親愛家人的選擇，化為崇高的生命軌跡，不僅彰顯新加坡先賢先烈為家園奮鬥的情操，更呼應以人性化角度來敘述歷史的展覽主題與目的。再者，展區也介紹張永福、林義順、陳楚楠集資所辦的革命報「中興日報」，是當時南洋地區最重要的反清媒體，其中的副刊以另一種形式開啓民智，被視為是新馬華文報章副刊文化的濫觴，同樣呼應了新加坡與辛亥革命的連結。

第三展區是關於革命成功的故事。有一大看板顯示世界各報對孫中山的報導，顯示辛亥革命的意義超越了國家與亞洲區域的層次，應該在世界體系中被認真看待。民國成立後出現的愛用國貨運動，可以看到報紙宣傳購買國貨，鼓吹以消費中國內地、海外華人生產的產品應引以為傲，並加以支持。愛國情操與商業活動的結合，與現代個人主義式的消費行為形成一強烈對照。顯示新加坡文化傳承中，商業利益與理想價值的相容性。另一方面，也再次呼應集體情感與共同價值的意識形態。故事結束在孫中山過世，當地有不少的追悼歌曲，並有華僑集結的追悼大會寫真。

第四展區是民國建立後對南洋的影響，尤其是在教育、經濟發展等面向。此區可以看到戰前土生華人如何學習中國文化，戰前的課本以互動方式展出，亦有戰前教室的擺設。戰前的革命支持者在戰後轉向教育工作，如，亦是同盟會會員的陳嘉庚、林文慶等人開始成立當地最早的華人學校，像是華僑中學與南洋女中，是華人華文教育的始祖。一方面，原來的方言教學開始轉型為華文教學。另一方面，改變了傳統的受教方式、型態與內容，教育從私塾型態轉為以科學性概念進行教育設計，而為提升女性的教育程度所設立的華人女子學校，也是現代化的象徵之一。因此，華僑興辦教育的活動，為新加坡帶來教育現代化的影響。其中，陳嘉庚的辦學主要集中在廈門、集美（廈門市集美鎮，陳嘉庚的故鄉）和新加坡三地。在 1920 到 50 年代，新加坡華文教育所需的師資許多是來自集美學校、廈門大學⁹的畢業生，或任職過的教員。這樣的關係也進一步地連結民國建立後

⁹ 陳嘉庚於 1921 年創辦廈門大學，曾邀請林文慶擔任校長，以西方對知識學門之分類規劃此依綜合性高等學府。不少集美學校、廈門大學畢業生到東南亞各地華文中小學任教，並不限於新加坡。陳終生傾資傾力挹注教育活動，視興辦教育是出於國民自覺(見陳毅明 2004；林金枝 1994；

對新加坡的影響。王鼎昌前副總理在華僑中學的畢業證書亦被展出，強化了辛亥革命對新加坡的延續性影響。此展區的另一重點是介紹東南亞華人的經濟體系。華僑在新加坡多從種植黃梨（鳳梨）、香料、橡膠，或從採礦起家，而在後革命時代，華人轉向經營實業，例如展覽即列出當時當地主要的銀行。展覽特別介紹陳嘉庚與林文慶的經營經驗，從創業、面臨困難、克服挑戰，再到經營管理創新的過程，並介紹各在地華人社群或商業團體的形成，帶動日後新加坡的發展。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林義順連同嚴永城、林文慶等人成立怡和軒俱樂部，作為支持中國國內革命運動的華僑商人的交流之處。同盟會志士在怡和軒拍攝的相片，更因怡和軒具華人富商俱樂部的色彩，而產生實業建國與救國的連結，也呼應第一展區對陳楚楠的介紹，是個「以教育及實業救國救民」的實踐者。

其中東南亞華人實業家所遭遇一段無法抹滅的挑戰，即是面對日軍的佔領與破壞。二戰期間，由於被日軍佔領，中國的海上運輸通道幾乎全被切斷，因此，滇緬公路成為中國唯一的國際道路。在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的號召下，三千多名南僑機工擔負運送物資與軍人的工作，補充中國貨車維修人員與駕駛員的不足。機工生活艱苦，更有三分之一的人數殉職。南僑機工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日軍佔領新加坡後遭到對付。日軍來後將新加坡更名為「昭南島」，並進行所謂「大檢證」，即年齡介於 18 至 50 歲的華裔男子，均需至全島各登記所接受審問和確認身分，企圖以檢證方式，抓拿掃蕩仇日份子，這一事件在日後被稱為「肅清」。展覽顯示了抗日先烈及受害者的生命故事，例如張明遠、溫福安等人，大部分為家族有革命歷史的殷商，因「較有能力」抗日而遭到殺害。遭日軍佔領是集體經驗，受害與抗日則建構了集體記憶，因此呼應官方的國族建構，當地社群與集體的概念產生是早於 1965 年獨立建國之時。

最後有幾幅油畫展示，其中一幅是 2001 年開幕即留到現在，畫著孫中山深入市鎮和鄉村，向礦場的礦工演說，宣傳革命真理。另一幅是以當地的唐人街為背景，孫中山、黃興、胡漢民與當地支持者的合影。辛亥革命史與新加坡在地性在晚晴園的戶外空間得到另一連結。花園裡有一棵孫中山從故鄉翠亨村帶來的「烈士樹」，¹⁰這個樹種在東南亞相當常見，但只有這一棵見證了晚晴園與孫中山的連結。戶外並有日後在主題公園風潮下特別種植的熱帶水果樹，包括孫中山愛吃的鳳梨、芒果、山竹、南洋香蕉等等。除了水果樹之外，戶外還特別種植橡膠樹。這是因為獨立前的華僑多從經營橡膠園起家。因經營橡膠園致富的華僑們形成華人社群，最後帶來中華總商會的成立，也因其財富能力貢獻於革命運動。橡膠樹因此代表了後革命時期的歷史建構。戶外空間的「詩學」，印證了 Lidchi 所說既臨摹現實，又宣稱本真性的再現策略。從室內的油畫延伸到戶外空間，仍是以孫中山為核心，並從圍繞其旁的革命志士出發，隨著革命支持者的後代在新加

林德時 2008)。

¹⁰用刀子割破樹身，會流出鮮血般的紅色汁液，如同烈士流血的情景，故名。

坡落地生根，將新加坡的歷史起源與發展拉開了縱深。晚晴園新開放的展覽減少了孫中山與南洋的連結，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與辛亥革命的連結。晚晴園在隸屬於文物局之後，也肩負起國族建構的責任。

在 2011 的重新開幕之後，晚晴園也陸陸續續舉行相應的活動。例如舉辦「百年辛亥憶晚晴」系列講座、並舉辦「辛亥革命：孫中山、革命志士與新世紀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¹¹2012 年還有「百年回眸：新加坡與辛亥革命」的巡迴展覽，¹²鼓勵辛亥革命和新加坡產生連結的歷史走出展館。晚晴園本身也成爲中、小學帶領學生戶外教學的場所，館內也特別爲兒童舉辦「輕鬆認識孫中山與晚晴園」的活動，¹³顯示辛亥革命的歷史脈絡也開始進入國民教育的規劃。

四、展覽政治與國族建構的歷程

從晚晴園的新展覽中，可以看到兩個操作企圖：一、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將國族建構的想像推至獨立建國之前；二、是新加坡今日的經濟表現並非理所當然，而政府重商的意識型態並非只是全球化競爭下實用主義的產物，卻是有其更爲深遠的歷史意義。要能達到這兩個企圖需要重新召喚歷史，在這過程中，國族建構的歷史系譜被重新想像。例如：從獨立建國開始的重商思維，一直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出於小國生存危機感而選擇的發展路線，但在晚晴園作爲國家史蹟之後，重商意識形態則被賦予了實業建國救國的必然脈絡與歷史精神。而在國家認同的部分，辛亥革命，乃至於發源於星、馬的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從來與新加坡作爲一國族的想像沒有關係，但在政府企圖拉開新加坡國族想像的縱深下，藉由晚晴園的地位改變，以抗日經驗作爲連結不同族群的共同記憶。例如：李光耀前總理在新加坡淪陷二十五週年之際，表示二戰經驗加速了不同移民社群的團結。由於集體受害，不同族群結合爲命運共同體。藉由分享同樣的經驗，同屬於一個社群的生活感油然而生（引自 Blackburn 2008: 108）。以下將過去的歷史事件與今日的展覽再現對照，來分析國族建構如何被重新想像。

（一）、新加坡作爲一「國族」的想像，從何時開始？

晚晴園關於日據時期的展覽，從每個受害者的生命故事透露這些人並非僅是華人子弟，而是在新加坡這個地方落地生根的人。這是從辛亥革命以降的脈絡下，日據時期影響過去的集體記憶，以及未來的國家發展，呼應跨族群的國族建構。然而，來自中國大陸、馬來半島與印度的移民，從殖民時期到二戰時期的認同並非是「新加坡」，而是認同自己的母國與母國文化。在新加坡的馬來人認同

¹¹ 時任台灣駐新加坡代表亦曾受邀，更因該代表未出席而被台灣媒體推測是影響台新關係原因之一。

¹² <http://www.wanqingyuan.org.sg/Exhibition-Programme-Past.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9 月 3 日）

¹³ 同上。

馬來半島上的社會文化；華人、印度人自認是過客，亦分別關注自己母國境內的國族主義運動；受英語教育的華人，或有專業技術的華人認同的則是英國

（Willmott 1989: 581; Chua 1998: 29; Lin 2012: 286）。¹⁴顏清滄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指出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星、馬華人表現出對中國命運的關切。星馬華人的民族主義情感，並非來自對英殖民政府的仇視，而是出於對中國社會境況和未來的擔憂。換句話說，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與星馬當地國族運動並無關係，而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延伸（1982: 397-9）。

另一方面，曾有學者指出：殖民統治抹去新加坡歷史的特性，時時提醒新加坡應附屬於更大的單位。例如，附屬於東印度公司、英屬海峽殖民地、馬來西亞聯邦，或馬來西亞。殖民歷史使得關於新加坡的想像是破裂的、去疆域化的，而附屬於不同的行政單位阻礙了國族歷史的形成。作為被殖民的對象，顯示新加坡做為國家的獨特想像，應始於獨立建國（Ban, Pakir and Tong 1992: 3）。Siddique在某個程度而言，認同這樣的觀點。她認為新加坡在 1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聯邦之前，「獨立的新加坡」認同從未被認真考慮過。在與馬來西亞聯邦合併初期，人民行動黨提出了馬來西亞認同不等於馬來文化的挑戰，並以早在 1950 年代就提出的 4Ms 模式：多元種族（multiracialism）、多元語言（multilingualism）、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多元宗教（multireligiosity），提倡「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Malaysian Malaysia）。¹⁵換言之，當時尚未有獨立的新加坡認同，所謂的新加坡認同，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直到 1965 年建國之後，才出現「新加坡人的新加坡」（Singaporean Singapore），並以 4Ms 模式作為國族建構基礎（1989）。

因此，新加坡作為一「國族」的想像，自始便與辛亥革命無太大關聯，甚至，華語、華文教育與維護中華文化在建國初期是被打壓的。當地華人族群在戰後分為兩派的衝突，是最明顯的例子：以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以及左翼華人運動分子。前者代表了受英語教育的現代化驅動者，後者代表了受華文教育的共產黨員，把持工會，組織學生運動，經常示威、罷工，被視為是進步發展的障礙（Hong and Huang 2008: 6, 186; Tan 2004）。當後者被以「內安法」為名清除，人民行動黨的執政等於確定了反共路線與資本經濟發展路線（Chua 1998: 31），也等於否定了政治多元的空間（Vasil 2000）。在 1960 與 70 年代，認為政府敵視華語與中華文化的媒體與文化界人士，多遭到指控或拘留。事實上，在經過與左派的政治鬥爭之後，以華文作為媒介的教學逐漸式微，其中以作為東南亞華語教學標竿的南洋大學，因被視為是極端反殖民的溫床，遭到與以英語教學的新加坡大學合併

¹⁴Lin（2012）的文章指出「海峽華人」在各歷史階段的定義，相當程度地解釋了（在海峽殖民地出生的）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對英國有忠誠感之因。

¹⁵也就是不認同馬來西亞的種種偏馬來人政策。

的命運，最引起當時爭議。¹⁶到了 80 年代之後，隨著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新加坡政府的態度有所轉變，華人文化不再等同於極端主義。例如，從原本排斥南大的激進歷史，到認可它曾經遵循社會文化的規範。¹⁷另外，儒家倫理開始被編入教育課程，政府也開始推行「說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¹⁸Tan 即認為新加坡在 1965 到 1979 年處在「去華人性」的階段，目的是避免外界視新加坡為「第三個中國」(third China)，亦是從「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過渡到「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認同建構階段 (2003: 753-4)。

晚晴園被定為國家古蹟之前，新加坡華人隨中國內部紛爭分裂為保皇派與革命派；後來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以及後來的左派與非共產黨。晚晴園獲得國家古蹟的定位，可從政府改變了看待左翼華人的態度脈絡中得到理解。當早期左翼華人不再被視為威脅，國族建構的想像也才能往前推進至殖民時期與二戰時期。政府對華語、華人文化的態度改變，帶來了孫中山地位的復興，也使得當地革命先賢的後代開始願意捐出史料與文物。¹⁹從孫中山地位的復興，到當地先賢的後代們落地生根，代表移民社會的轉型，以及轉型後對新加坡的認同。晚晴園在政府意識形態的改變中獲得新的歷史定位。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歷史論述與再現策略，試圖將國族建構往前推進至二戰期間，同時不違背 4Ms 基礎。例如：新加坡政府將每年的二月十五日（新加坡當年遭日軍佔領之日）訂為全民紀念日。在 1998 年，更將該日訂為全面防衛日 (Total Defense Day)。戰後，原由中華總商會主導設立的戰爭紀念碑，政府介入設立立場，認為設立條件應符合「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而非僅反映某族群的意識與價值。因此，新加坡的戰爭紀念碑是屬於國家的公共空間，並非定位是華人社群的紀念空間。作為也具有再現意義的景觀，當戰爭紀念碑在新加坡淪陷 25 週年時揭幕，時任總理李光耀就說：這個由四根由粗漸細的柱子組成的紀念碑，象徵四個族群的文化最後會融為一體（海峽時報，1967 年 2 月 16）。因應李總理的談話，中華總商會在該年籌辦的紀念活動，亦邀請了馬來與印度族群參加 (Blackburn 2008: 105-110)。新加坡的淪陷與艱苦的日據時期歷史，亦在 1990 年代初期被編進教科書，不分族群地提醒下一代這個「歷史的教訓」(Wong 2001)。因此，原本由華人主導的抗日經驗 (Cheah 1987)，在政治論述的改變下，藉由各種文化再現（從戰爭紀念碑到教科書的內容，再到晚晴園的展覽），服膺了社會整合所需要的意識形態。

(二)、突顯「實業建設」乃新加坡國運所繫之本質

¹⁶合併後稱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採英語教學。1987 年，英語成為新加坡所有學校的第一語言。

¹⁷這番轉折可從南大五十週年時，李顯龍所發表的談話中得知。(見 Hong and Huang 2008: 27)

¹⁸推行「說華語運動」當然亦有為順利進入中國市場的經濟因素考量。同時，「說華語運動」並非排斥英語，而是排斥各地方言 (Tan 2003; Chua 1998)。

¹⁹當地革命先賢的後人表示，經過這麼多年都沒想過將先人文物捐出，是因為之前認為這些東西與新加坡無關 (Hong and Huang 2008: 197)。

晚晴園中的革命志士，身兼實業家身分，在歷史敘述裡呈現了救國救民的貢獻。²⁰在展覽內容中，從辛亥革命一直延續到抗日救亡運動的脈絡，從果園、橡膠園起家的華人實業家們將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拉開了歷史的縱深。展覽的「詩學」與「政治」表達了實業精神帶動了新加坡日後的發展，新加坡今日的經濟面貌非一蹴可及。然而，新加坡政府在建國初期認定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並非在辛亥革命以降的脈絡下形成。

人民行動黨政府在建國初期，面對嚴重的失業問題、貧窮問題、教育程度不足問題、住房短缺問題等，體認到新加坡最迫切的生存問題應從經濟發展著手（Velayutham 2007: 26-30）。經濟發展應是不分族群的共同努力目標，並以此作為結合不同族群的集體意識。因此，國族建構的核心元素是經濟發展。發展經濟的理由，一是因為多元移民人口。二是因為當新加坡作為轉口貿易中心的角色逐漸消失，政府初期依賴工業化發展，現階段則依賴全球化，視全世界為輸出市場（Quay 1990: 46）。殖民時期的新加坡人口多是客居，為尋找賺錢機會而來。新加坡政府在建國初期，一方面需要承諾穩定的經濟機會，另一方面視國族建構的基礎，是在不同族群中持續整合新加坡國家認同（Quay 1990: 45）。從 1965 年開始，新加坡政府實施以輸出為導向的工業化政策，並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外資投資星國（Rodan 1989; 1997）。工業化也因此對新加坡的經濟成長與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對政府而言，經濟蓬勃發展與提升民眾生活條件，變成是最有力的意識形態。經濟成功帶來物質條件，隨之帶來人民對政府的支持，也因此強化了人民行動黨的合法性。經濟發展於是成為國家發展的首要考量。

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在建國初期的反共路線，以及在資本經濟發展的考量下，奉萊佛士為國父，即是說服英國與其他可能的國外投資者，新加坡不走左派路線，新加坡的國族主義並非與外資為敵。相對地，政府採取的自由貿易政策也確定了萊佛士的歷史評價與地位（Hong and Huang 2008: 5）。曾任重要內閣成員的 Rajaratnam 說：萊佛士的確是帝國主義者，但他並非以掠奪、剝削方式開發此地，也不以恐怖暴力作為統治。他對新加坡的規劃是成為貿易中心，歡迎任何有心經營的人前來（引自 Hong and Huang 2008: 16）。在新加坡河畔留下萊佛士雕像，即表示過去的英治留下了正面的影響（Hong and Huang 2008: 17），是一種出於生存危機感而有的再現策略。²¹

與萊佛士的歷史評價平行檢視人民行動黨政府對左派華人的態度，可以發現態度的轉變是另一種進入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出於生存危機感而有的策略。反共原是人民行動黨的核心意識形態，但隨著冷戰結束，反共意識形態的強度也隨

²⁰顏清滄指出：關懷母國的海外華僑並非只有富商，還有許多在南洋工作的苦力，雖過著艱苦生活，仍會每年寄錢回家鄉（1982: 398）。但這些苦力的歷史，顯然被排除在國家歷史敘述之外。

²¹萊佛士的地位也顯示新加坡的歷史，並非是專屬於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甚至是馬來西亞的歷史，亦有平衡多元族群的功用。

之消退 (Tan 2003 ; Hong and Huang 2008: 20)。另一方面，早期政治菁英與共黨對抗的經驗，不再是國家歷史敘述的主體，也並非是目前新加坡規劃全球城市經濟，與吸引外來人才的挑戰。相反地，曾有左派色彩的華人，如今則因其事業規模與慈善行為而成爲模範，不被排除於國家歷史之外 (Hong and Huang 2008: 8-9)。實業建國與救國的文化政治將新加坡的歷史起源與經濟發展，安排了看似既無可避免，也是最佳選擇的結合，同樣呼應了延續到今日的生存危機意識形態。

生存危機的意識形態除了建構經濟發展的必然性與重要性，需要被時時提醒，以藉由經濟成績強化跨族群的國族建構。例如：1963 到 1965 年之間的歷史被賦予新的重要性。這段從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到被驅除的歷史從 1997 年的國民教育課程裡開始有新的角色。對李光耀而言，新加坡原本沒有獨立的條件。然而，沒有「合併」的歷史，就沒有獨立的新加坡；沒有這段痛苦的經驗，就沒有「生存的教訓」(引自 Hong and Huang 2008: 21)。李光耀與後來的吳作棟分別在不同時間指出：如果馬來西亞不再偏袒特定族群，或是新加坡經濟發展失敗，星、馬有可能再度合併 (Hong and Huang 2008: 22)。藉著國人對可能再度合併的反感，刺激生存危機意識的發展與延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新加坡剛起步的工業化頓失馬來內陸市場，島國生存之危機感，只有依靠經濟導向的發展。這樣的危機感合理化重商意識形態的發展，並以經濟基礎造就「比較性」的新加坡認同。例如：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可以以生活物質條件、經濟發展條件、甚至政府腐敗程度，與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馬來人區隔。同樣的比較，當然也適用於新加坡的華人與印度人 (Chua 1998: 42-3)。²²於是，生存危機、經濟發展與認同建構緊密結合，並於文化展覽中再現。

五、結語

新加坡的歷史變遷，就是經濟變遷的過程。從殖民時期作爲港口貨物集散地開始，到依賴貿易與外資發展製造業，再轉型至發展知識經濟的全球城市。新加坡過去與現在的歷史想像，一直被放置在「進步」的論述中，進步帶來改變，也因此一直有著「過渡」的特質。新加坡從殖民地發展到獨立國家，再從工業化經濟轉型到全球城市，強化了新加坡隨著經濟發展，而處於不同時期的國家。這種過渡特質伴隨國家生存的焦慮。新加坡政府的生存危機感，隨著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文化政治。晚晴園從不受到重視的私人宅邸到成爲官定國家古蹟，即爲一明顯例子。晚晴園新的展覽內容，符合了新加坡作爲一「國家」的想像；符合「新加坡人」的認同想像；也符合新加坡在全球化時代下的生存危機想像。晚晴園的展覽內容雖然召喚過去的歷史，但是認同的基礎不在過去，而在一起奮鬥的現在與未來。族群、歷史等議題，不再置於（以中國爲中心的）南洋

²²例如：楊榮文認爲孫中山的未竟之志最後在新加坡實現 (引自 Hong and Huang 2008: 193)。其實暗喻中國大陸與台灣各有不如新加坡之處，亦是另一種比較性地建構新加坡認同。

區域認同，而是國家認同的一部分。從歷史的角度，新加坡的危機感來源有戰後的左派華人、與馬來西亞聯邦的合併與遭到驅除，以及多元移民人口。而這些危機感，最後都從經濟發展獲得整合。另一方面，對照晚晴園中的展覽政治，館中的辛亥革命與抗日運動，最後亦由跨界企業精神獲得整合，並鋪陳出經濟發展的歷史傳承性與必要性，重商意識形態亦以不同形式得以延續與發揚，從泛華人民族主義的「實業救國」，轉化為強化新加坡國族意識的「實業建國」，不僅得以正當化為國族建構的基礎，也正當化了執政黨的統治。晚晴園服務了國家意識形態，但也再次印證了 Halbwachs (Halbwachs 1992; Smith and Alexander 1996) 所說：集體記憶是被選擇性地記錄，也被每一代不斷地更新或重新形塑。它也印證了 Lidchi 所言：文化展覽絕非是中立的行為，其「詩學」與「政治」反映了某些價值判斷。

參考書目

- 元輝，2002，〈晚晴園：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中華魂》8：55。
- 王嵩山，2006，〈博物館蒐藏的詩意與政治〉。《博物館學季刊》20(2)：5-6。
- 朱宏源，1992，〈從族國到國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與言》30(2)：7-38。
- 林金枝，1994，〈陳嘉庚傾資辦學的國際影響〉。《廈門大學學報》4：9-18。
- 林德時，2008，〈陳嘉庚傾資辦學的特點及其啓示〉。《集美大學學報》9(1)：36-40。
- 金衝及，2001，〈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近代史研究》5：1-20。
- 孫中山，1981a 《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
- 孫中山，1981b，《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
- 彭一萬，2011，〈新加坡晚晴園與辛亥革命〉。《炎黃縱橫》5：6-8。
- 程農，1992，〈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問題與辛亥革命〉。《歷史教學》7：3-6。
- 曾信傑，2010，〈政治對博物館的影響〉。《博物館學季刊》24(4)：95-113。
- 楊兆麟，2002，〈在新加坡追思孫中山—晚晴園參觀見聞〉。《遺聞錄》9：35-39。

- 陳毅明，2004，〈論陳嘉庚星學的歷史功績〉。《集美大學學報》7(4)：7-14。
- Ang, Ien and Jon Stratton (1995) “The Singaporean Way of Multiculturalism: Western Concepts/Asian Ways.”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10(1): 65-89.
- Ban, Kah Choon, Anne Pakir and Chee Kiong Tong (1992) *Imagining Singapor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Blackburn, Kevin (2008) “Nation-Building, Identity and War Commemoration Spac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Rahil Ismail, Brian Shaw and Ooi Giok Ling (eds.)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Globalizing World: Diverging Identities in a Dynamic Region*. Burlington, VT: Ashgate. pp. 93-113.
- Cheah, Boon Keng (1987)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46*, 2nd editi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Chua, Beng Huat (1998) “Racial Singaporeans: Absence after the Hyphen.” in Joel S. Kahn (ed.) *Southeast Asian Identities: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and Thai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28-50.
- Clifford, James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uncan, Carol (1988) “Art Museums and the Ritual of Citizenship.”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p. 88-103.
- Duncan, Carol (1995) *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the Public Art Museums*. New York: Routledge.
-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bsbawm, Eric (1992)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Hong, Lysa and Jianli Huang (2007) *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Interview: Lee Kuan Yew, Asian Values and the Crisis. (1998) *Times*, 16 March.

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 (1990) "Objects of Ethnography."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p. 386-443.

Lavine, Steven and Karp, Ivan (1990) "Introduction: Museums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p. 1-10.

Lidchi, Henrietta (1997)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xhibiting Other Cultures."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p. 151-222.

Lin, Chua Ai (2012) "Nation, Race, and Language: Discuss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in Colonial Singapore, Circa 1930." *Modern Asian Studies*, 46(2): 283-302.

Luke, Timothy W. (2002) *Museum Politics: Power Plays at the Exhib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cVey, Ruth (1984) "The Nation-State in Southeast Asia." in Joo Jock Lim and Vani Shanmugaratnam (ed.) *Armed Separat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3-29.

Quay, Jon (1990)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Nation-Building." in Jon Quah (ed.) *In Search of Singapore's National Valu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 45-65.

Rodan, Garry (1997) "Singapore: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Social Divisions." in Garry Rodan, Kevin Hewison and Richard Robiso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38-177.

Short, John and Yeong Hyun Kim (1999) *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Siddique, Sharon (1989) "Singaporean Identity." in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eds.) *Management of Success: 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563-577.

Smith, Philip and Jeffrey C. Alexander (1996) "Durkheim's Religious Reviv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2): 585-592.

Spencer, Crew and James E. Sims (1988) "Locating Authenticity: Fragments of a Dialogue."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p. 386-443.

Tan, Eugene (2003) "Re-engaging Chinesenes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eratives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The China Quarterly*, 175: 751-774.

Thomas, Nicholas (2001) "Indigenous Presences and National Narratives in Australasian Museums." in Tony Bennett and David Carter (eds.) *Culture in Austra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99-312.

Vasil, Raj. K. (1995) *Asianising Singapore: The PAP's Management of Ethnicity*.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Velayutham, Selvaraj (2007)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N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Wang, Gungwu (2005) "Nation and Heritage." in Wang Gungwu (ed.) *Nation-Building: 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251-277.

White Paper (1991) *Shared Values*.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Printers.

Willmott, Willaim E. (1989)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ism." in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eds.) *Management of Success: 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578-598.

Witcomb, Andrea (2003) *Re-imagining the Museum: Beyond the Mausoleum*. London: Routledge.

Wong, Diana (2001) “Memory Suppression and Memory Producti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in T. Fujitani, Geoffrey M. White and Lisa Yoneyama (eds.) *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Pacific War(s)*,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18-238.

Ybarra-Frausto, Barbara (1988) “The Chicano Movement/The Movement of Chicano Art.”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p. 128-150.

Yen, Ching Hwang (1982)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Modern Asian Studies*, 16(3): 397-425.

本文獲行政院國科會計畫 99-2410-H-003-158 之資助。作者並且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寶貴意見。